

能近取譬：孔子成仁之教的方法论阐释

杨 琪

(天津商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能近取譬”是孔子提出的思维方法,包括引譬达类和观物比德两种典型的思维形式,具有明理、教化和审美三大功能。该思维方法通俗易懂、委婉含蓄、形象生动,不但在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的传播与传承中有重大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之方;能近取譬;观物比德

中图分类号：G40-0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1-0019-05

《论语》中,孔子提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以朱熹^[1]、冯友兰^[2]、张岱年^[3]等为代表的思想家都是用“推己及人”和“忠恕之道”予以阐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有所突破,杨树达先生提出“能近取譬”并非推己及人,而是“万事万物在此身之外者皆引之与身相合”的方法^[4]。张晓芒^[5]、王明辉^[6]、黄朝阳^[7]等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孔子是“譬”式推理方法的中国逻辑第一人。从孔子阐述仁学体系的角度来看,“能近取譬”首先还是“仁之方”,即孔子成仁之教的方法论,系统阐述这一方法论对于深入理解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能近取譬”的典型思维形式

孔子关于“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的论断,表达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能近取譬”是一种方法;二是“能近取譬”是实践“仁”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引譬达类”和“观物比德”两种典型思维形式。

1. 引譬达类

“引譬达类”是“能近取譬”的基本思维推理形式之一。“类”是逻辑学最基本的范畴,是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任何事物只要

有共同的属性,就可以建类。而从概念内涵所反映的事物属性相同或不同,可以确定事物的类别关系。类比推理根据两个(类)对象一些属性相同或相似,推出一个(类)对象也具有另一个(类)对象的已知某一属性。因此,进行类推的前提就是建类。“取譬”的过程就是“推类”的过程。董志铁教授指出,推类是将某个(某类)事物的道理,推广到其他相类事物的思维过程,其结构通常由“言事”与“言道”两个部分组成。“言事”与“言道”的关系是“言事”为“言道”服务,类推的最终目的是“言道”,证明自己或反驳他人的主张。“言事”与“言道”联系的桥梁是“喻”,其理论根据是:所言事与道之间共同存在的“义”。找到事与道之间共同的“义”,便可“扶义而动,推理而行”,由“事”理过渡到“道理”^[8]。孔子在弘扬“仁道”的教学实践中,常用到“譬”式推类法。西汉刘向《说苑·建本》载: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壻,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

子路向孔子请教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

收稿日期:2014-11-11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唐代贞观时期国家知识创新机制研究”[TJQT11-013]

作者简介:杨琪,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释古礼,孔子认为不可以。他举了两个譬喻来进行推理:东夷仰慕华夏的仁义,有个女子,丈夫去世了,替她找了一个男人,让她终身不嫁,不嫁虽然不嫁,但是这并不是贞节;苍梧之弟,娶了一个漂亮老婆,请求与他的兄长交换,虽然看起来很忠诚,却合乎礼。这两个譬喻讲的是两件事,是“言事”部分。“言道”部分就是:按自己的意思解释古礼会引起是非混乱,只有按照古礼的原意去解读和执行才能正确行事。东夷之女与苍梧之弟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华夏的礼,结果荒唐可笑。孔子十分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古礼。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其中“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是“言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言道”。在古代推理中,“达类”就是达成“事理”的一致,即墨子讲的“援类”。

2. 观物比德

“比德”在现代学术史上一般被视作中国美学史用语^[9]。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观物比德”首先并不是出现在美学领域,而是思维方法领域,孔子非常重视“比德”的方法。李宗桂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观物比德”,作为《诗》六义之一的比、兴手法,实质上就是类比法^[10]。自然事物虽然本身并不具有人格特征,但是,中国古代的先民通过“比德”来获得自然的智慧,超越自然事物的界限,与人文价值之间关联起来,达成推类的理据,从而使自然成为人立身行事的依据,实现自然法则向人文法则的转化。“观物比德”的思维形式和“引譬达类”稍有区别,主要表现在“观物”“体道”上,通过“观物”,体验“物”之理,进而感悟“人”之道,最终依然是在“体道”上达成统一。《荀子·法行》记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贵玉而贱珉?是不是因为玉少而珉多吗?”珉是类似于玉的石头,但不是玉。孔子认为,怎么能以多少作为贵贱的衡量标准呢?玉之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能给人智慧启迪。“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这句话提出了观物比德的思维方法。温润而泽、缜栗而理、坚刚而不屈、廉而不刿、折

而不挠、瑕适并见等都是玉的属性,由此联系到人的仁、知、义、行、勇、情等。通过观物比德,实现对“道”的体验,从而获得生存智慧。《易经·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勤奋不止,比德于天”;《易经·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宽容大度,比德于地”。孔子还喜欢观水,《大戴礼记》载:

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痹下,偃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真苞里;不清以入,鲜絮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孔子观水比德的记载也和观玉比德一样,通过对水的特质考察,达成对人的德行的深刻反思。观物比德的方法通过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分析和思考,获得行事推理的直接依据,影响极为深远,这早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传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如各种玉饰、自然景观、文化艺术作品、生活生产用具等凡是与人相关的器物或作品都与“比德”相关联,成为对人进行潜移默化地教化的途径。

二、“能近取譬”的范围

“能近取譬”的方法中,“近”是关键。“近”指的是“取譬”的范围要贴近实际,让人容易接受。这是达成“论辩”效果的关键所在。从孔子“取譬”的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经典、事例和器物三个大类。

1. 取譬于经典

孔子整理六经,一方面,六经中有大量运用“取譬”方法的文字,可以用来实施教化;另一方面,孔子在教学中大量引用经典开展教学工作。《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主要运用赋比兴的方法,比兴之法就是类推的方法。孔子主张多读《诗经》,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经》中有大量的“譬”,通俗易懂,感人至深。“兴”,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朱熹注:“感发意志。”说明《诗经》的比兴方法能抒发感情,使读者感情激动,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观”是指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通过诗歌可以认识政治得失;“群”是指诗可以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怨”是说诗可以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在教学实践中,孔子经常运用经典来做“譬”,进行推理、论辩。如《荀子·大略》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圻，皋如也，隤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贡倦于学习，孔子逐一引用《诗经》名句来“取譬”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一咏三叹，最后得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结论，引发子贡的共鸣。

2. 取譬于事例

孔子善于借助生动的事例来启发人的智慧，把抽象的思想与生动的生活经验故事化、形象化，并将“仁”的价值寄托在故事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说苑·政理》载：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以为公名？”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齐桓公打猎，误入一山谷，找到一位老者，打听到这是愚公之谷。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老者原来养的母牛下了小牛，被人以“牛不能生马”的荒唐理由牵走了，乡亲都以为老者愚蠢，所以才以此命名。第二天，桓公把这事告诉管仲，管仲立刻反省检讨，认为这是司法不能维护社会正义的结果，马上加强政府管理。孔子运用齐桓公遇愚公的故事生动地阐述了治理国家必须谦虚谨慎、殚精竭虑、不能有丝毫懈怠的道理。齐桓公和管仲都是十分高明的管理者，尚且还会出现恶霸仗势欺人，百姓忍气吞声不敢告官的社会现象，更何况是管理水平不及齐桓公与管仲的人呢？

3. 取譬于器物

孔子非常重视器物系统“取譬”。教育者通过器物(包括实用器物和审美器物)来取譬，使人获得“事理”上的启迪。《荀子》载，孔子带着学生参观鲁桓公庙，看到有欹器，孔子说，我听说欹器的特点是“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于是现场实验，验证了这个结论。孔子感叹道：“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欹器又称“宥坐之器”，就是放在座位右边用于劝导警戒的器具，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能给人以启迪与教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到了器物取譬的功能，倡导把生活中的器物系统都加上价值符号，如书房的门窗做成冰裂纹，喻示读书辛苦，板凳一坐十年冷，家具雕刻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形象，喻示要做谦谦君子。儒家重视教育，把譬式思维方法深入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各家各派中找不到第二个。

三、“尽善尽美”：“能近取譬”方法论的价值追求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尽善尽美”被视作孔子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同样也体现在“能近取譬”的方法论上。

1. “明理”以“尽善”

“能近取譬”的思维形式都是要达成对“道”的体悟，这一体悟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明理”的过程，“能近取譬”的方法都要围绕“明理”这个核心来展开和实现，“明理”才能做到“尽善”。孔子说：“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辟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若夫无类之说，不形之行，不赞之辞，君子慎之！”(《韩诗外传·卷五》)“辟”与“譬”通，“辟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就是通过“譬”来阐明道理，通过“类”来感悟真理。孔子认为，只有从内心体悟到了“仁道”，才能真正转化为行为的动力，把“仁”落实到行为中去，成为生命价值的核心。他在评论“士”时指出：“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在孔子看来，“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如同性命肌肤一样不可替代。“知”就是“明理”，这是立身行事的前提和基础，“能近取譬”能帮助自己和他人明白事理，获得行动的依据和指南。“引譬达类”和“观物

比德”最终目的就是“达类”，“知类”是“明理”的体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儒家把“知类通达”作为学有所成的标志了。

2. “观物”以“尽美”

由于道理的言说极易沦为空洞的说教，而“譬”能由此及彼，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引发思考，“譬”的方法为人提供了思维的空间，有时候为了更具有启发效果，古人甚至不把“言道”的部分说出来，只“言事”或“观物”，不直接揭开谜底，这样，思维的空间就更为宽广。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审美价值成为了可能。没有“言道”只有“言事”和“观物”的“譬”只给读者提供一个意象或一个故事，这正是《诗经》“比兴”方法的典型表现手法。文辞优美，意象朦胧，在获得推理价值的同时也获得审美的体验。“善”的价值通过“美”的意境展现出来，既满足人的理性追求，又满足人的感性体验，做到尽善尽美，这就是孔子“能近取譬”方法论的最高追求。孔子善于运用“譬”的方法，尽善尽美地运用说服艺术，让对象能在审美体验中获得对“道理”的深刻认知。“仁之方”的审美功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能近取譬”方法论的特点

1. 通俗易懂，说服力强

“能近取譬”的思维方法强调一个“近”字，主张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用身边常见的事情来打比方，让人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借助于一个或多个足以说明事理的故事来启发人的智慧，把抽象的思想与生活经验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荀子·尧问》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息。为人下者，其犹土也。”

这段文字，孔子阐述了“为人下者之道”，他用“土”的特质来做“譬”，表达出作为普通群众深沉厚重、宽容博大、勤勉多功的价值，形象生动，贴切自然。

2. 委婉含蓄，容易接受

孔子把“能近取譬”定义为“仁之方”，这不论是从说服自己的角度，还是从说服别人的角度，都体现出委婉含蓄的特点。从自我说服的角度看，他主张通过“譬”推知他人在此环境条件下亦当有类似体验，从而理解对方的心理和行为，孔子据此提出了诸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反省内求的委婉含蓄的行为与价值要求；从说服别人的角度看，孔子反对冒冒失失地直言，主张通过事例或事物来委婉劝说。孔子说：“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白虎通·谏诤》）谏，指的是古代规劝君主、尊长和朋友。这是古代运用论辩艺术最多的人际活动，其目的就是说服人。孔子认为，谏有五种方式，分别是“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说苑·正谏》），“讽谏”就是委婉规劝。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论语·颜渊》）“譬”的方法通过讲故事、打比方，启发对方去思考，而不是直接的说教，这种委婉含蓄的思维方法不但有助于明了事理、修养身心，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避免直接的冲突，容易让人接受。

3. 形象生动，寓教于美

“能近取譬”把事理寄寓于故事、自然和器物之中，引譬连类，观物比德，形象生动，寓教于美，能更有效地激发人的价值联想和价值迁移。孔子正是通过《诗经》等含有大量“譬”的经典文本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陈元晖先生指出，孔子对其弟子进行审美教育，主要是通过学《诗》来进行的。其次就是通过音乐教育，以及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随时使学生心情愉快，乐天并歌咏自然^[11]。清代哲学家焦循在《毛诗补疏序》中说：“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而言不本于情性，则听者厌倦。”孔子有时不言“理”而言“情”，但“理”在“情”之中，有时不言“理”而言“物”，“物”美不胜收，而“理”在美中。可见，孔子的教育方法，注重的是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弟子才觉得夫子是“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孔子在“能近取譬”方法的运用中，将真、善、美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五、“能近取譬”方法论在成仁之教中的价值

前述从思维形式、范围、价值追求和思维特点四个角度阐述了“能近取譬”方法论，但是这还只是形式方面的诠释，要深刻理解“仁之方”，还要从“成仁”的内在逻辑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孔子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有的学者不理解这句话，认为自己还处于“欲立”和“欲达”的阶段，怎么可能做到“立人”和“达人”^[12]？张岱年指出“仁”本质就是“成己成人”^[13]。张先生的概括直指孔子“仁教”本质。在孔子

的成仁之教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教化与提升的过程，“欲立”和“欲达”指的是主体的心理期望状态，“立人”和“达人”指“使人立”、“使人达”，是行为的目标期望状态，表示一种价值取向，即“要使人立”和“要使人达”，不一定非得自己“立”了才萌生使别人立的念头，自己“达”了才萌生使别人达的念头，在一念发动之处即可观照人我。两个“欲”字，确凿无疑地表明，这种“立人”、“达人”的目标行为状态，还只是一种未发生或未实现的心理行为倾向。因此，从“欲立”“欲达”到“立人”“达人”完全是从一种心理行为倾向走向另一种心理行为倾向，这种心理行为倾向的转变就是价值取向的转变，也是情感取向的转变。可见，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孔子这里对仁的界定是一个“原则性”的描述^[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指自己想立就要进而想到使别人立，自己想达就要进而想到使别人达。按照这种语义解释，显然它不是指一种具体的行为，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抽象的处事原则，从“爱己”走向“爱人”的一般原则。孔子有言“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无一不充分体现这一基本价值原则。普遍的价值原则与具体的操作方法显非一事，不可混同。

进一步讲，从自己想立达到使别人立达，这之间靠的不是亲情，而是一种胸怀天下、物我兼照的情怀和境界。正因为这一原则跨越了“一己之私”，所以它不是低层次的价值取向，而是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要跨越“人己之障”，需要行为者自身找到自己行为的价值依据，“心服”，然后才能“行”。怎样才能使自己“心服”呢？孔子紧接着说的“能近取譬”就是使自己“心服”的方法。

“能近取譬”方法论从“引譬达类”到“观物比德”，无不充分考虑到“人”的需要，通过经典、事例和审美活动，达成认识上的自觉，实现在教育过程中的

真善美的统一。《学记》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记·学记》）孔子“能近取譬”的方法论，通过寓言、故事、自然意象等“言事”的感性形式，把干巴巴的理论说教的“道”变得生动活泼，使学生在理解案例的过程中受到“仁教”的启蒙。通过“譬喻”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不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鼓励学生进步，不勉为其难，倡导独立思考，不强制灌输，引导而不强制，鞭策而不强迫，学习才会轻松，启发而不替代，学生才会独立思考。可见，“能近取譬”方法论在成仁之教中承担的是“仁”的价值启蒙与传播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委婉含蓄的思维方法，达成“仁”的价值的传承，这对于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参考文献：

- [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4]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张晓芒.“譬”的思维方法及其在现代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5-18.
- [6]王明辉.何谓逻辑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 [7]黄朝阳.譬的思维[J].晋阳学刊,2001(4):33-38.
- [8]董志铁.“推类”的构成、本质与作用——三论“引譬、援类”[J].毕节学院学报,2010(7):52-55.
- [9]冯契.哲学大辞典(上)[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 [10]李宗桂.中国传统文化探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 [11]陈元晖.孔子的美育思想[J].孔子研究,1987(1):46-50.
- [12]杨普罗.再释“仁之方”[J].学术研究,2002(1):102-105.

Analogizing through Pi: Explanation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Methodology

YANG Q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Analogizing through Pi is an ancient thinking approach by Confucius, it involves two typical thinking, one is analogizing through Pi, and the second is analogizing by observe things. Such method is help for understanding theories, educating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It is euphemistic, vivid and easy to understand. It not only has very important value in Confucianism,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nfucius; benevolence method; thinking method of Pi; analogizing by observe things